

YINGHAN YUPIAN DUIBI YU FANYI

# 英汉语篇对比与翻译

◎ 朱晓东 著



非外借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www.nnup.co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英汉语篇对比与翻译

◎ 朱晓东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语篇对比与翻译 / 朱晓东著. --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681-4292-2

I. ①英… II. ①朱… III. ①英语—语法—对比研究—汉语 ②英语—翻译—研究 IV. ①H314 ②H146  
③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8082号

---

- |                                    |                                     |
|------------------------------------|-------------------------------------|
| <input type="checkbox"/> 责任编辑: 卢永康 | <input type="checkbox"/> 策划编辑: 王春彦  |
| <input type="checkbox"/> 责任校对: 肖茜茜 | <input type="checkbox"/> 封面设计: 优盛文化 |
|                                    | <input type="checkbox"/> 责任印制: 张允豪  |

---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净月经济开发区金宝街118号(邮政编码: 130117)  
销售热线: 0431-84568036  
传真: 0431-84568036  
网址: <http://www.nenup.com>  
电子函件: [sdcbs@mail.jl.cn](mailto:sdcbs@mail.jl.cn)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幅画尺寸: 185mm×260mm 印张: 17.75 字数: 385千  
定价: 63.00元

---

# 前 言

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信息科技时代的到来，促进了世界上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中国同样包含在内，并且随着“一带一路”及世界形势的发展，我国对外交流越来越多，交流的范围与领域也越来越广。因此，社会对优秀翻译人才的需求逐年增加，国内翻译学界的专家学者共同致力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这些研究成果中，英汉语篇的对比与翻译研究可谓“异军突起”，不仅在专著与论文数量上占据优势，还出版了很多相关的教材。可见，语篇对比与翻译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迎合了人们实际、交流的客观需求。

因此，本书以英汉语篇特征的标准、语言的元功能、语篇类型这三个方面的理论为基础，结合翻译理论和实践，多角度、多层次分析和探讨语篇翻译的一些核心问题。本书共分八章：第一章主要综述翻译的发展及概念等基本学科问题，明确接触翻译时先会遇到的概念问题；第二章探讨对比分析与语篇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明确语篇对比分析和语篇翻译研究的重要意义；第三章从文化角度出发，将语言视为一种重要的人类行为符号系统，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下的英汉翻译，从功能、形式和情景间互动的角度，对翻译的全过程所涉及的语言与语篇因素进行观察、描写和分析，兼顾了语言与文化两个方面；第四章重点对比分析英汉语言及文化，对语音与书写系统、语义、句法结构、话语和篇章结构、语言外因素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要达到良好的语篇翻译效果就离不开译者角色的重要作用，因此第五章主要是翻译中的译者角色、主体性分析和对译者素质的要求；第六章侧重于实践部分，详细讲述了在进行英汉翻译时常常会遇到的句型、惯用方法和翻译技巧；第七章仍属于翻译技巧方面的延伸，扩展到语篇整体的翻译优化层次；第八章是重要的翻译实践部分，强调翻译前的文本对比分析，重点针对新闻语体和文学语体的翻译过程与重难点展开讲述。

本书理论与实践并重，涉及内容丰富，例证翔实且新颖，可作为英汉语篇对比与翻译研究者的参考资料，也可用于翻译教学实践。成书结果离不开对翻译前辈教学与研究结果的借鉴，也离不开家人朋友的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17.6

# 目录

- 第一章 翻译发展概述 / 001
  - 第一节 翻译基本问题的阐述 / 001
  - 第二节 中西方翻译史概述 / 007
  - 第三节 翻译的定义与分类 / 011
  - 第四节 翻译的过程和基本标准 / 015
- 第二章 对比分析与语篇翻译研究概况 / 036
  - 第一节 对比分析的学科基础与方法 / 036
  - 第二节 语篇的语义分析与语境分析 / 039
  - 第三节 对比语言学、语篇语言学和对比语篇学与翻译研究 / 052
- 第三章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下的英汉翻译 / 056
  - 第一节 翻译研究的功能语言学途径 / 056
  - 第二节 言语交际中的语篇属性和翻译评估 / 071
  - 第三节 翻译过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阐释 / 081
  - 第四节 基于文本的翻译质量观 / 093
- 第四章 英汉语言及文化对比分析 / 105
  - 第一节 语音与书写系统的对比 / 105
  - 第二节 语义对比 / 108
  - 第三节 句法结构对比 / 111
  - 第四节 话语和篇章结构的对比 / 114
  - 第五节 语言外因素的对比 / 116
- 第五章 翻译中的译者 / 119
  - 第一节 译者的角色 / 119
  - 第二节 译者的主体性分析 / 121

第三节	翻译对译者的素质要求	/	123
第六章	英汉翻译的常用技巧	/	131
第一节	翻译技巧概述	/	131
第二节	英文句型与惯用方法	/	132
第三节	英汉翻译常用技巧示例	/	201
第七章	英汉语篇的翻译优化	/	222
第一节	英汉两种语篇的特点	/	222
第二节	英汉语篇衔接差异分析	/	225
第三节	英汉语篇连贯对比分析	/	231
第四节	语篇的布局方式及翻译转换趋势	/	233
第八章	各种语体对比与翻译	/	240
第一节	翻译前的文本对比分析	/	240
第二节	新闻语体的翻译	/	246
第三节	文学语体的翻译	/	254
参考文献		/	275

# 第一章 翻译发展概述

## 第一节 翻译基本问题的阐述

什么叫翻译？广义地说它包括的范围很广，甚至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但本书只集中在语言上，所以要讨论的翻译就是指如何将某一语言活动的言语产物转换到另一语言中去。严格地说，翻译应包括某一语言内不同变体间的转换，如将屈原的诗译成现代诗，将曹植的《洛神赋》译成白话文，都应属于翻译。因为这类翻译同样要克服时空两方面的困难，几千年前的汉语和今日的白话汉语虽都属于汉语，但毕竟差别太大。战国时代的文化和今日中国文化虽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也不能同日而语。正因古今有差别，所以才有必要将古文译成现代白话文。在这类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遇到的困难会和英汉翻译中的困难完全不同，但就其本质而言，两类翻译颇有相似之处。不管是哪类翻译，语内也好，语际也罢，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把原文的意思在译文中表达出来。

尽管古今中外的译界学者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方法截然不同，但是这个核心问题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有人把这个问题归纳成“忠实”这个概念，也有人认为“忠实”这个概念不够科学，所以提出了一些更严谨的概念，如功能对等、等值、信达雅等，让人耳目一新。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各类应用语言学分支学科应运而生，探索翻译的工具越来越得心应手。在这些新工具、新方法的帮助下相信新的概念还会出现。但这不会改变翻译的本质，翻译就是在某一特定的社会环境内进行交流的过程。如果这么说仍然不够大众化的话，那么可以用下面的话概括翻译的定义：把原文中的意思在译文中表达出来。

这句普通人都听得懂的话落实起来并不容易，问题出在“意思”两个字上。There is a book on the table. 这句话的意思清清楚楚，翻译起来不至于有什么问题。只要将后面的地点提到句首，就是一句地道的中文句子。但有些句子如果照字面直接译过来，意思就不够清楚，句子中的有些意思会紧紧地结合在语言本身的形式上，使译者不得不考虑将语言的形式也照搬过来。《傲慢与偏见》开头一句是这样的：“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 本句中的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和后面的 that 子句的位置在译文中就不宜颠倒，因为原文文字前后的排列可以产生一种讥讽的口气。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Although this is not a universal truth, the social conventions of money and marriage are such that a lot of people go about behaving as it were true.” 尽管单从翻译技巧上看，可将 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放到后面，但译者还是有必要尊重原文的句法结构。有时意思和语言结构完全绑在一起，而英汉两种语言结构上又水火不相容，这就造成不可译性。比如，在“The air war heats up as the air war heats up.”这句话中，作者故意在语音层上玩弄了一个小“把戏”，将音和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不可译性。本句的背景是北约对科索沃空袭，air war 既可指空袭，也可指传媒竞相报道，两个用法在英文语义场上有联系，但在中文里却无法将空袭和传媒战用一个语言单位表达，结果译者就无法像原作者那样重现原文的语言“把戏”。

所有这些都说明简简单单的一句“将意思表达出来”，做起来并不容易。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很多具体的问题都会冒出来。这些问题是译者和学者研究的对象，于是翻译界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论战，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些问题大致包括如下内容：

1. 直译还是意译 (Literal Translation vs. Free Translation)
2. 功能对等还是形式对应 (Functional Equivalence vs. Formal Correspondence)
3. 重原文的形式还是重原文的内容 (Form vs. Content)
4. 靠近源语还是靠近译入语 (Source-oriented vs. Target-oriented)
5. 以原作者为中心还是以译文读者为中心 (Author-centered vs. Reader-centered)
6. 原作者写作的目的还是译者翻译的目的 (The Purpose of the Author vs. The Purpose of the Translator)

## 一、直译还是意译

这是一个一直以来就争论不休的问题。在有些情况下，直译和意译不构成翻译问题。例如“I like the movie.”译成“我喜欢这个电影。”就没有直译和意译之争，因为直译和意译完全是一回事。但由于英汉语言间差异非常大，译者往往会面临两种选择，一个句子可以直译也可以意译。在这种情况下到底采取直译法还是意译法，就会引起人们的争论。当然，不同的人在用这两个概念时可能会有所不同。有些人认为逐字翻译为直译，但大部分人都认为直译并不一定要到“逐字”翻译的地步。一般来说，比较遵照原文语言结构的译法就是直译，而脱离原文语言结构的束缚，只译意思的译法可称为意译。逐字翻译、直译、意译和解释翻译之间并没有十分清楚的界限。但将直译和意译这两个概念用来讨论翻译还是很有用的。比如，下面这句话既可直译又可意译，“The Negro lives on a lonely island of 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 vast ocean of material prosperity.”有人译成：“黑人依然生活在物质富裕的汪洋大海中贫乏的孤岛上。”这是比较接近原文的直译法，用了和原文相同的形象，如“物质富裕的汪洋大海”，其优点是保留了原作者的比喻。但恰恰是由于不肯割舍比喻，结果在可读性方面就差了些，不仅行文比较别扭，而且“汪洋大海”这个常有负面含义的比喻和“物质富裕”放在一起也显得很失调。这时，多一点意译成分就可避免直译的弊端——“黑人仍生活在贫困的孤岛上，尽管放眼四周，是一片繁华景象。”这个译法增加了可读性，当然其不足之处是没有反映出原文的比喻。又如，“The Negro is still languishing in the corners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finds himself an



exile in his own land.”这句话有人译成：“黑人依然在美国社会的角落中饱受痛苦，并发现自己是自己国土上的流亡者。”这是比较贴近原文的直译法，特别是后半句照搬了原文的语言结构，其可读性自然就差些。增加意译成分可提高可读性：“黑人仍然在美国社会的角落里过着痛苦的生活；美国虽是他们的家园，而他们却感到流落异乡。”译者进行了语境的解读，因此翻译时就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再如，“But if you look back at the sweep of history, it's striking how fleeting supremacy is, particularly for individual cities.”可译成：“然而，如我们对历史稍作回顾，便会惊觉尘世的霸权地位是多么地变动无常，尤其是一座座的城市。”但这种比较直的译法在可读性上并不得分。意译似可使意思更清楚，并增加可读性：“然而，你若纵观历史，便会惊觉鼎盛繁华转瞬即逝，城市的兴衰更是弹指间的事。”但是意译并不等于肆意改动、添油加醋，如下面的译文就有过度诠释之嫌：“回首风云变幻的人类历史，你会感到任何辉煌的事物都如昙花一般转瞬即逝，特别是城市更容易被历史湮灭。”译文中的“风云变幻”“昙花一般”“被历史湮灭”都是不当的添加。虽然并非完全是言外之意，但放在句中反而繁复累赘，失去了译文的简洁。

直译的缺点显而易见，它常使译文读起来吃力，所以大多数人都主张不把直译作为翻译的主要手段，只是在一些特殊的文本中酌情使用直译。但也有人给予直译更高的地位，如纽马克就比较认同直译这个概念。他的观点基于他自己在印欧语言之间翻译的实践，但实际上并不一定适用于英汉翻译。在英汉翻译领域，尽管直译应该有其一席之地，但广为大众接受的译文几乎很少是以直译为主要手段的。

意译虽然被大多数译者采用，但有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意译超出了限度就会扭曲原文的意思，把原文没有的意思加到译文中。一般来说，如果原文的意义不是通过语言形式表达的，那么意译就不会丧失意义。但如果原文的意义有一部分是通过语言形式本身表达的，则意译往往会抹掉那些由形式附带的意义。上述说法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英汉翻译实践中也可能行不通。比如，有些文学作品中的意义是通过语言手段表达的，本该用直译法表达才可反映出语言形式所载的意义。但英汉语言差别很大，照原文搬过来的译法在印欧语言间也许可以接受，在英汉翻译时汉语却不能接受这类表达法。因此，有些中国学者主张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应多用意译。刘宓庆也将诗歌之类的文学作品放到不求字面对应，但求保证可读性一类，认为有时必须完全意译方能达意。这种主张与西方理论家们将文学作品列入表情类，应采用直译的理论似乎略有不同。其实，文学作品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作品适合多用直译，有些则适合多用意译，要因文本而定。

英汉翻译中有些句子显然应该用直译，有些则只能用意译。而对这些显而易见的情况，译界往往没有争议，直译和意译确实可以交替使用，相互取长补短。但在翻译实践中常会遇到一些既可直译又可意译的情况。这时到底取直译，还是取意译就会成为一个问题。比如，“A man may usually be known by the books he reads as well as by the company he keeps, for there is a companionship of books as well as of men.”这句话有人采用比较直译的方法译成：“人往往可以从一个人所交往的朋友以及所阅读的书去看他的为人，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有友谊。同样的，人与书之间也有书谊。”但有的译法意译成分

更多：“所谓欲知其人，先观其友，看一个人读什么书也能了解一个人，因人不仅能与人为友，还能与书为友。”上面两句虽然都有些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地方，但都是中文读者可以接受的。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两种方法都可以，到底用哪一种？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更大的范围着手，孤立地谈直译和意译实际上没有多大价值。一个句子到底应直译还是意译，往往要考虑到文本、读者，甚至翻译目的等因素，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定理。北京大学辜正坤教授在讨论文学翻译时，对直译和意译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论述，概括得很全面：“直译，意译，各有千秋，译者依据功能、审美、读者层三要素，宜直译就直译，宜意译就意译，能神游于规矩之内，亦能神游于规矩之外，能循规蹈矩，亦能叛道离经，方称得上翻译的行家里手。”

但有一点应该特别牢记，当今英汉翻译活动的主体并非文学翻译。在经济、科学、新闻、政论等文本中，语言形式不是关键的因素，译文就应尽量保持译入语的特色。在英汉翻译中发挥中文的优势始终是译者要努力的方向。这一点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尤为重要。因此，假如直译法有悖汉语行文习惯，造成翻译腔，译者就应该采用意译法。换句话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略微偏重意译仍然是应该提倡的。不过，对于较正式的文本，如政、经、法方面的文件等，不过度偏离原文的译法仍然会频繁使用。

## 二、功能对等还是形式对应

这一对概念实际上早有人提出，但由奈达加以完善，成为翻译理论研究中一对很重要的概念。所谓功能对等，就是指译文要在语言的功能上和原文对等，而不是在语言的形式上和原文对应。形式的对应是机械的，表面上看和原文一样，但由于语言系统不同，相同的语言形式并不一定能起到相同的作用。比如，“He is the last person I will ask for help.”这句话可以译成：“他是我会要求帮助的最后一个人。”以求形式上与原文对应，但本句的实际意思是“我是不会求他的”。后面的译法在语言形式上和原文完全不同，却在语言的功能上和原句对等。再如，美国的中学生常会和家长说：“Tomorrow is a minimum day, could you pick me up at noon?”其中，minimum day要是译成“最小日”，是保留了原文语言的形式，但谁都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所以，译者应求得本句在汉语中功能的对等，而放弃形式对应：“明天只上半天课，提前放学。能在中午就来接我吗？”

根据奈达的理论，功能对等是以读者的心理反应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原文读者读原文获得的心理反应和译文读者读译文的心理反应相似。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功能对等有很多优点，最主要的就是有利于信息的交流。用功能对等法译出的句子符合译入语行文的习惯，没有翻译腔，一看就懂。但反对功能对等的人则说，功能对等太灵活，会漏掉或歪曲原文中的信息。

虽然功能对等和意译、形式对应和直译在概念上不同，但它们实际上是从不同的概念出发，殊途同归，引出了跨语言交流中的问题所在。

### 三、重原文形式还是重原文内容

内容和形式之争是文学批评领域的主要焦点，在跨语言交流中就显得更加突出。大部分情况下，原文语言形式不是译者要传译的。英汉两种语言在语言形式上截然不同，所以在翻译上不必去反映原文的形式，只要将原文的内容译出来就可以。但作家的艺术特征是由语言形式来反映的，形式就变得很重要了。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在反映内容的同时，照顾到语言的形式。

但是，我们有必要记住，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面临的障碍毕竟来自原文的语言形式，过于强调形式的译法往往使译文缺乏可读性。所以，尽管在个别情况下有必要在译文中反映原文中有特殊意义的形式，但翻译过程中总的策略应该是偏重内容。

### 四、靠近源语还是靠近译入语

这对概念和上面几对概念有关，但前面几对概念主要和言语行为有关，而靠近源语还是靠近译入语这对概念则还涉及语言体系。有人主张译文应靠近原文，因为语言反映文化，原文中的语言特色即便不是作者风格的体现，也有必要在译文中表现出来。因为原文语言特色反映原文所在文化的特色，译者有必要将这种特色介绍过来。他们还认为过多地为读者着想，会“宠”坏了读者，应该相信译文读者有解读原文语言形式的能力，靠近原文的译法能把读者拉到源语中，使读者能“身临其境”地欣赏外国作品，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这种说法实际上是让翻译挑起过重的担子。语言形式不应该拿来当作文化介绍的工具。除了为某一特殊目的，如用靠近源语的译法翻译以反映原文表达的文化特点，以供学术研究所用，大多数情况下译者翻译的任务还是以传达信息为主。介绍源语文化不应该以牺牲译入语表达习惯为代价，因为靠近源语的译法总是会生成很多不符合译入语习惯的句子。真正想通过语言了解外国文化的话，有必要鼓励读者学外语、读原文，因此翻译的基本方法应该主要是向译入语靠拢，尽量发挥译入语的优势。

### 五、以原作者为中心还是以读者为中心

这对概念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上面谈到的相同问题。如果译文以原作者为中心，则可能反映出原文的一些行文特色；如果译文以读者为中心，则可能发挥译入语的优势。原则上讲，不应以原作者为中心，但这也要看原作者是否重要。一个会议记录的作者和一个获奖文学作品的作者就不能认为同样重要。大部分文本的作者都应该“隐藏”在文本背后，不应该在文本中显露出来。一则电脑软件使用说明、一个法律条文、一则食品广告等，都不会呈现原作者的“影子”。换句话说，读这些文本后读者看不出作者为何人。但有些文本则可能“文如其人”。一读作品，读者马上就会感到与众不同，遣词造句，甚至布局谋篇都有原作者留下的痕迹。因此，一般认为如果“文如其人”，译者除翻译原

文的内容外，也有必要使译文能“文如其人。”而大部分西方翻译家认为，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语言形式是使译文“文如其人”的方法。但也有人认为，相对等的语言形式在译文中不一定起到同样的作用，而主张用符合译入语的相似的语言形式来达到“文如其人”的效果。如果做不到这样的话，也就只好把它归入翻译的不可译性。

我们并不绝对排除有时以原作者为中心会是译者所应采取的方法，但这种译法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小的。翻译的总原则是以读者为中心，这一点在英汉翻译中尤为突出。

## 六、原作者写作的目的和译者翻译的目的

人们动笔写作一般都有目的，不论是原作者还是译者，总是为了某一目的而动笔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原作者的目的和译者的目的基本一致。用英文写一个电脑操作说明的人是为了让顾客了解如何操作电脑，翻译这个操作说明的译者也是为了让不懂原文的顾客了解如何操作电脑，所以原作者和译者目的相同，都是要将信息准确地传达给读者。一则服装广告的作者希望用广告影响顾客的行为，使顾客看了广告后会花钱买产品；一个译者翻译同一则广告的目的也是为了影响顾客，促进消费。一份经济合同的作者希望合同能成为某项经济活动的基础，翻译这份合同的人也希望不懂原文的人能看懂原文的内容，以便使合同中的经济活动可以展开。一则交通广告的作者希望用广告将有关交通的信息告诉大众，同一则广告的译者也有相同的目的。因此，大部分翻译工作的目的和原文写作的目的相同。这些文本有一个特性，即都是为一个非常实用的目的而写，翻译的目的也十分实用。

但不是所有翻译的目的都和原作相同。诗人写一首诗可能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感。译者将诗直译成中文，以便进行英汉语言对比，译者的目的就和原作者不一样。戴高乐在“二战”时的一些讲话有鼓舞士气的目的，半个世纪后戴高乐的讲话已成历史文件，翻译这些讲话就不是为了戴高乐原来的目的。

这就引出不同目的、不同读者和不同译文的问题。由于译者的目的和服务对象会与原文的目的、对象不同，所以同一个原文有几个不同的译文是完全正常的。《圣经》写作的目的是要将上帝的话传给世人，但写作时用的语言不是以儿童为对象，有人将《圣经》译成儿童语言，读者对象不同，但目的依然如故。为了适合不同读者群，用不同的文体来译同一个原文应该被允许。一首英文诗可译成五言诗，供喜爱唐诗的人欣赏；可译成词曲，供喜爱词曲的人欣赏；可译成现代诗，供喜欢白话诗的人欣赏。译者服务对象不同、目的不同，译文也可以迥异。

但也有人不同意上面的看法，认为原作只有一个，译文也应该只有一个，不应该千面千腔，最终在译文中找不到原作的影子。然而，翻译毕竟有其局限性，很多文化内涵强的作品一旦完成，就很难恢复其原貌，因为时过境迁，作品依旧，但作品存在的环境变化了。同一语言文化如此，何况跨语言文化的翻译。因此，翻译文化内涵强的作品从来都有侧重，因为译者服务的对象不同，翻译的目的也不同。下面这句话最能概括这个道理：Who is translating what, for whom, when, where, why and in what circumstances?

分析了这几对概念之后，我们对本章开始时提出的命题（把原文的意思在译文中表达出来）就有了一个理性的认识。这些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讨论翻译的核心问题。虽然角度不同，但都落到同一个焦点上，即如何将原文的意思在译文中表达出来。了解了这些基本概念后，我们就会更清楚地认识那些五花八门的翻译标准和原则。这些标准和原则是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空里，对同一问题的解决之道。它们一方面反映了标准设立者在翻译研究上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在翻译研究中左右为难的境遇。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左右为难的事。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论，依照有些理论从事翻译实践，译出来的文章有原文的影子，但依照另一些理论从事翻译实践，译出来的文章完全像译入语。原文的影子在译文中可浓、可淡、可无，有人主张在译文中保留一些“异国情调”，有人则主张用地道的译入语。这之间如何把握、如何拿捏，不仅在理论上大有文章可做，在实践上也是需要倾注毕生精力的大事业。

## 第二节 中西方翻译史概述

### 一、中国翻译史简介

中国翻译史源远流长，其发展史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发展史的缩影。早在西周时代，不但有关于翻译活动的史实记载，而且在《周礼》和《礼记》两部古书中，还有周王朝翻译官专门职称的记载。此后，翻译活动就一直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过程中。

漫长的中国翻译发展史，大致可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从汉末到宋初并在隋唐达到鼎盛的佛经翻译时期（5—10世纪）；明末清初（17世纪末18世纪初）对西学的译介；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时期；五四运动以后的社会科学和新文学翻译时期；新中国翻译时期。各个历史时期都造就了一批杰出的翻译家。

#### （一）古代繁盛的佛经翻译

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发生关系开始于东汉末年，伴随着印度佛教文化的东传与佛经的翻译。据《高僧传》卷一记载，东汉末年僧人安世高于147年至170年遍游西域各国后抵达洛阳，将带回来的佛经译出34部，包括《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道地经》等。安世高是我国最早的佛经翻译家之一，也是我国翻译史上最早的直译者代表。

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史，从发展过程来看，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早期：自佛教传入以后，历经东汉、三国至西晋。这一时期共译经书近570部，其中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竺法护等是杰出的代表。同时，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如文与质的关系问题、翻译标准问题等。《法句经·序》是我国

翻译史上迄今所见论述翻译理论的第一文。

发展期：从东晋至隋代。东晋以后，佛教翻译事业获得很大发展，进入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共译经书 3155 部，是翻译事业的一大进步。从东晋至隋约有翻译家近百人，重要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有鸠摩罗什、彦琮、道安、慧远、真谛等。其中，道安提出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翻译理论和彦琮提出的“十条八备”翻译理论都对我国传统翻译思想做出很大贡献。

成熟期：唐代。这一时期，我国的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其特点表现为：主译者以本国僧人为主，他们都精通梵汉，深晓佛理；译经的计划性更强，节译、选译者较少，往往翻译全集；译场制度在这一阶段发展得更为完备；所译佛经在忠实原著方面，大大超过前代。这一时期著名的翻译家有玄奘、不空、义净等。玄奘是伟大的翻译家，他与鸠摩罗什、真谛、不空一起被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经家。玄奘在二十余年间，共译出大小乘经律论 75 部，1335 卷，译籍之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洞晓佛典，梵汉兼精，独得传译之便。他的译文精美，译风严谨，远远超过前人。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求俗”的翻译主张。他既不赞成道安等人的直译，又不赞成鸠摩罗什等人的意译，而是主张直译和意译完美结合。这是我国古代翻译思想的光辉典范。

衰落期：唐代以后。这一时期我国佛经翻译事业从鼎盛逐渐走向衰落，到北宋仁宗景佑年间，最终结束。至此，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佛经翻译），在经历了草创、发展、成熟、衰落四个时期之后，完成了历史使命。

佛经翻译在中国延续千年以上，它起自汉魏，盛于隋唐，续至宋元，对于中国文化，举凡哲学、宗教、文学、音韵学、语言文体、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各个方面，无不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家不仅译出了浩如烟海的经书，还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他们的翻译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 （二）明末清初对西学的译介

明末清初（17 世纪至 18 世纪初），大量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宣扬基督教，同时传播科学。此时，我国翻译事业拉开了科技翻译高潮的序幕，由之前的宗教著作翻译发展到具有独立学术价值的哲学、伦理类著作，尤其是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生物、医学等自然科学著作。这一时期杰出的代表人物为著名的科技翻译家、中国“科学译祖”徐光启和“中华才士”李之藻。

## （三）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

清末民初（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大批忧国忧民的先进人物面对民族危机，图自强，谋复兴，共赴救亡图存大业，积极推动翻译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培养早期科学人才，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一次开创了西学翻译的高潮。此次翻译高潮又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洋务运动时期的翻译、维新时期的翻译和 20 世纪初五四运动之前的民国时期的翻译。洋务运动时期的翻译活动创设了外语与科学技术兼学的近代学堂和翻译机构，翻译了大批科学技术书籍，对清末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改革起到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维新时期在广设译学馆、广译西学、造就翻译人才等方面的贡献，其规模之大、学科之广、数量之多、质量之精，是洋务运动时期的翻译不可比拟的。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之前的民国时期，以章士钊、胡以鲁、容挺公、朱自清等人为代表，掀起了一场“译名大讨论”其影响甚为深远。

这次西学翻译高潮，培养和造就了自己的翻译家，建立了自己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如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这一时期，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有马建忠、李善兰、华蘅芳、徐寿、严复、梁启超、林纾、辜鸿铭、陈季同等。

#### （四）五四运动以后的社会科学和新文学翻译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界线。五四运动以前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翻译了大量西方国家带有浓厚资产阶级思想的科技著作、学术名著和文学名著。五四运动以后，我国的翻译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翻译作品多以介绍西方国家带有无产阶级思想的文学作品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经典著作为主。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进入了翻译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翻译事业的中坚力量有著名的文学家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郑振铎、郁达夫、叶圣陶、巴金、林语堂、朱光潜、朱生豪、傅雷等，还有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如陈独秀、李大钊、张闻天、成仿吾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是五四运动后我国翻译事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主要有李大钊、李汉俊、李达、李立三、王一飞、艾思奇等，其中最影响的译作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它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就是郭大力译介的《资本论》。

#### （五）新中国的翻译事业

新中国翻译事业以“文化大革命”为分界线。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以前，人们不仅重视翻译实践本身、翻译作品的质量，还注重对翻译理论、翻译原则的研究。在翻译理论建设和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对翻译标准的再论争，创立了“四论”（茅盾的“意境论”、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论”和焦菊隐的“整体论”）等，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同时，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型翻译家，如茅盾、傅雷、钱钟书、曹靖华、焦菊隐、董秋斯、戈宝权、叶水夫等，因此翻译作品的质量得到了大大提高，对翻译标准的认识也日趋统一。

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日益频繁的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促进了翻译事业的新繁荣，开展了对外国文化新一轮全方位的、大规模译介活动，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这次翻译高潮信息量更庞大，涵盖范围更广，题材与体裁更丰富多样，操作方式更灵活、便捷，技术装备更先进，从业人员更多，受益者更普遍，理论研究更活跃。在这次翻译高潮中，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时期，著名的翻译家有杨宪益、季羨林、王佐良、许渊冲、叶君健等。



## 二、西方翻译史简介

翻译在西方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翻译实践活动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罗马文学三大鼻祖之一的维乌斯·安德罗尼柯翻译的拉丁文版《奥德赛》被视为西方翻译史上最早的译作。其后的一些大文学家，如西塞罗、贺拉斯等，也都开始尝试用拉丁语翻译或改写希腊戏剧作品，从而掀起了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一次翻译活动高潮。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带有明显的文学活动的性质，到了古罗马后期，随着文学创作活动的减退，文学翻译也趋于消沉。

进入罗马帝国后期，宗教翻译成为西方翻译界的主流。405年，圣·哲罗姆对照希伯来原文翻译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该译本成为罗马天主教所承认的唯一文本，也成了后来大多数欧洲国家翻译《圣经》时所依据的主要原本。罗马帝国后期，另一个令人瞩目的翻译家是奥古斯丁，他提出了在翻译中应考虑“所指”“能指”和译者“判断”的三角关系，因此被奉为西方翻译史上语言学派的鼻祖。

进入中世纪后，欧洲各地开始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国家。尽管罗马教廷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一再要求用拉丁语翻译《圣经》，但欧洲各地用民族语翻译《圣经》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因此，从13世纪开始，形成了用民族语翻译《圣经》的高潮。欧洲中世纪翻译史上著名的翻译家有英国的罗杰·培根和意大利诗人但丁。

14世纪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国的文学翻译和翻译理论发展尤为迅猛，犹如一次飞跃。这一时期，除了宗教翻译，翻译活动已经深入到思想、政治、文学和艺术等各个方面。德国宗教改革领袖和翻译家马丁·路德将《圣经》译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德语。这部译本的语言被誉为德语的典范，对德国语言的统一和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文学翻译的风气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显得更为浓厚，不但译者众多、翻译题材广泛，而且对当时英国的文学活动产生了直接和明显的影响。英国的戏剧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当时大量翻译、介绍罗马作家的戏剧作品以及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密不可分。在诗歌创作方面，托马斯·魏阿特于1557年出版的《歌曲与十四行诗》对英国诗歌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于是文学史家将1557年称作英国诗歌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法国，在文学翻译实践和理论上成就卓著的当推雅克·阿米欧和艾蒂安·多雷。阿米欧翻译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等对法国的文学语言产生了很大影响。多雷的主要成就在翻译理论研究上，他于1540年在一篇题为《论如何出色地翻译》的论文中，论述了翻译的几条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与后世翻译理论家所提的一些原则问题相衔接，因此多雷被称为西方近代翻译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提出翻译理论的人。

17世纪至19世纪，欧洲各国涌现出了一大批文学翻译名家和翻译理论家，出版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和人文科学译著。其中，著名的有英国的翻译理论家约翰·德莱顿和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德国的歌德和弗里德希·施莱尔马赫、维廉·洪堡特，他们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世纪后期，西方翻译活动的规模、翻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令人瞩目。翻译不再

局限于宗教和文学领域，而是深入到科技、教育、艺术、商业和旅游等社会各个方面。人们对翻译科学、翻译艺术、翻译技巧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翻译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第三节 翻译的定义与分类

#### 一、翻译的定义

翻译是什么？不同的人对此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会产生不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

语言学翻译观可分为传统型和当代型两种。传统型语言学翻译观以 19 世纪以来的传统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研究翻译问题，如英国的语言学家卡特福德认为，“翻译是一项对语言进行操作的工作，即用一种语言（SL）中的文本（text）来替代另一种语言（TL）的文本的过程。”张培基认为，“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苏联语言学家巴尔胡达罗夫则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连贯性话语在保持其内容即意义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连贯性话语的过程。”

当代语言学翻译观主要受当代语言学的影响，把研究的观点从语言本身扩展到交际语境、语域、语用等领域，认为翻译是一种交际活动。从语言的功能和交际的角度来研究翻译，一般注重的是翻译信息而不是文字，目的是与接受者的沟通。在西方翻译理论界，持交际翻译观的代表人物则是尤金·奈达。奈达认为，“翻译就是在译入语中再现与原语的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物，先是就意义而言，然后是就文体而言”，这条定义常常被人引用。奈达认为，理想的译文应该由读者的反应来衡量，即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应该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大致相同。

我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刘宓庆则认为，翻译的实质是语际的意义转换。蔡毅也认为，翻译的定义应该是将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

文艺学翻译观则从文艺学的角度来解释翻译。他们认为，翻译是艺术创作的一种形式，强调语言的创造功能，讲究译品的艺术效果。巴斯纳特、兰伯特、拉斐维尔等人是典型的文艺学派，他们认为翻译就是对原文重新摆布。在我国，持文艺学翻译观的人也很多。例如，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钟书的“化境说”。傅雷认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则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文化学翻译观则以文化为重点来研究翻译。持文化翻译观的学者认为，翻译不但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且是一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例如，王克非认为，“翻译是将一种语言